

国家艺术杂志

新民晚报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9年7月3日 星期三 第845期 |

| 首席编辑:吴南瑶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xmss@xmwb.com.cn

19



他们笔下的南湖、烟雨楼和红船

• 陈履生

陆俨少、唐云笔下的一大

嘉兴的南湖因为和中共建党的关系而成为革命历史的胜迹，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因此，在新中国美术创作表现革命历史的过程中，如何用中国画的笔墨去表现这一题材，尤其是用传统山水画的形式，一直是一个难题。

显然，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本体以及周边都是现代化的建筑，是过去传统的国画家们认为不入画的内容，或很难入画的对象，所以，很多画家起初举步不前，对此面有难色。上个世纪60年代初起，陆俨少（1909~1993）创作了表现中共一大会址的《伟大的起点》，则是非常勉强地以非洲国际友人下车步入会场的景象表现了这一题材的意义，建筑和城市中的电线杆、汽车等硬边，使他难以在笔墨上表现出自己的特长。而唐云（1910~1993）在1970年所画的《中共一大会址》，则缩小了视野，表现了一群戴红领巾的小学生从入口处进入纪念馆。他舍去了周边的环境，使建筑尽可能少地出现在画面中，可是，在画面中建筑横平竖直的关系中，依然显现了勉力为之的为难之处。这幅画直到1975年“重加点染并记”，而画面中小学生戴的红领巾在一段时间曾被取消，是1973年9·13之后才逐渐恢复，那么，唐云的“重加点染”的重点应该是在红领巾之上，表现出了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特色。客观来说，这幅画在笔墨上是相当的勉强，但可以说明这一题材的创作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左右为难，正反映了“建党”题材美术创作在新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亦古亦今画南湖

对于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画家来说，虽然经历了新中国的改造，可是，改造不仅是走出画室去写生，而是要用新的笔墨去表现时代，去为新社会服务。然而，这些文人画家面对现代建筑和城市景观，还是举步艰难。因为文人笔墨来传达政治主题中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在创作中放弃文人笔墨的那种价值观，非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大型美术展正在龙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陈履生先生是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研究专家，担任策展人。应本刊邀约，陈履生先生就建党主题创作撰文，特别是第一次对表现南湖这一题材中创作作品最多的画家钱松嵒先生最早的作品（1957年）等问题展开的论述，具有极高的史论价值。

—编者

一日之功，也非一日之迹。但他们非常努力，并积极适应新社会的社会要求。因此，他们将视线转移到了嘉兴的南湖之上。这种转移又和中共一大会场的转移一样，从上海到嘉兴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所以，表现嘉兴南湖同样是在表现“建党”题材的范围之内的另外一种选择。不同的是，南湖的自然与传统山水画的紧密关联，对于山水画家来说是得心应手。

嘉兴南湖实际上有两处重要的景观：一古一今，亦古亦今。古是始建于五代后晋年间（公元936~947年）的“烟雨楼”；今是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那条船。从古的历史上看，在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历史中曾8次登烟雨楼，先后赋诗20余首。在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几经兴废，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复建，现存的是民国7年（1918）重建的遗存。面对“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历史过往，烟雨楼的历史沧桑，成就了这一江南名胜的远近闻名。而亦古亦今是1959年10月1日，在烟雨楼成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从此，古代烟雨楼的身份发生了在今天的转变，有了今天特殊的地位。当代中国画家最早以“建党”题材来画南湖，现在可考的可能是朱屺瞻（1892~1996）于1961年7月10日创作的《南湖留胜迹》。画面以传统山水画三段式的构图画了南湖的全貌，中景的湖心岛不仅处于画面的中间，而且所占位置最大；烟雨楼和作为会址的船尽在画面之中。如果不看题跋，这是一幅典型的山水画，而且在笔墨上也表现出了乡野的趣味，毫无时代的装饰和题材上的刻意。特别有意思的是，画面中有一戴着草帽、背着画夹子、拿着笔的画家，正走在上红船的木板

上，应该是画家的自画像。另有一幅是原在上海美专任教、后在江苏国画院任职的余彤甫（1897~1973）的《南湖》，应该作于1957年。这幅画感觉是一幅水彩画写生。而画面是表现南湖的自然，近景以及主体是渔船，中景的主体是帆船，而烟雨楼只是一角出现在画面的左侧。显然，这幅画如果不是标题，那可能今天就无法指认其为“南湖”。这也说明对于南湖的表现，经历了由一般风景的描写到有着“建党”涵义的表现这一变化的过程。

现代画家最早画南湖的作品

钱松嵒先生（1899~1985）是在表现南湖这一题材中创作作品最多的画家。大概是1957年，“旅杭过嘉兴南湖”，画了一幅南湖写生。画面中近景是柳岸和系舟，远处是烟雨楼。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近景中的船并不是那条作为会场的船。关于那条作为会场的船，由于中共一大会议是租用的游船，而此后原船已不可追踪，同类游船也已绝迹。因此，1959年在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时，根据老船工的回忆，仿制了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得到了一大代表董必武的肯定，遂据此放大仿制而成为今天所见的那条具有特殊符号性的红船。钱松嵒1957年的南湖“写生”可能是现代画家最早画南湖的作品。后来这件作品收录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南京分会筹委会编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的《江苏画家旅行写生集》之中。而将其与余彤甫同年所作的《南湖》相比较，钱松嵒在“写生”的范畴内，其选景、构图与表现都已经超出一般的画家，而表现出后来他在山水画创作方面有所成就的

逻辑关系。钱松嵒1964年1月18日所画的《南湖晚霞》，至今悬挂在南湖的烟雨楼内。画面中的烟雨楼在柳树掩映间的上方，下面虽然有一条小船，却不是开会的那条大船。而面对钱松嵒在南湖题材方面的创作，又可以看到其中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反映了这一题材创作的时代特点。在1964年1月初前后，钱松嵒画了尺幅不大的《烟雨楼》（高27.8CM，宽34.7CM），由烟雨楼构成的湖心岛在湖水的衬托下，墨色氤氲，加上远处淡墨写就坡岸远景，干湿浓淡于一幅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笔墨变化，完全是久违的文人趣味，也不同于钱松嵒50年代以来改造过的笔墨特色。可是，此时画中的烟雨楼已经连接了南湖的象征意义，所以，此画也就不同一般，但它却像常见的中国画小品一样。此后，钱松嵒一画再画南湖时，画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要的是出现了具有符号性的那条船。其中的《南湖》，“访问嘉兴南湖，瞻仰革命纪念船”，虽然该画的结构比较简单，可是，画面中不仅出现了红船，而拱桥上的5个孩子正在走向红船，其中的寓意则非常明显。另一幅稍后的《南湖》，画面上是穷款，但画面结构复杂，表现出了创作中的各种精心安排。近景是松和竹，寓意长青；中景是拱桥，但柳树和盛开的桃花，则表明春天的一切；远处的柳树掩映中是红船——虽然在上方的远处，却是点睛之笔，表现出了题材的意义。

在表现“建党”题材的美术创作中，60年代初开始，老画家们相继着力于“建党”题材之上，表明了这一时期美术创作在题材选择方面的时代特点，以及老画家们在新中国的积极努力。但表现“建党”题材美术创作在指向南湖这一具体场景方面，表现了画家们将一大会址的南湖与山水画的完美结合，显现了老画家在新时代的新作为。这之中既有在山水画领域的革新、开拓的意义，又有对这一时期美术创作所具有的重要的示范性意义。显然，这一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可是，前辈画家们在时代的可能性中的开拓创新和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却是新中国美术创作的重要的文化遗产。